

邊防整體內縮的張力需要做出更合理的解釋，未來研究應當在本書基礎上繼續向明中後期推進。

概而言之，本書受到美國「新清史」、日本「大元史」的影響，重視君主通過個人關係建立多民族聯合政權的過程與方式，關注蒙古帝國的世界性長期影響，又在內容上反撥上述思潮，突破了多元清朝與一元明朝、明朝相對元朝轉入內向的扁平化敘事。明朝的「內亞性」此前並非無人關注。邵循正（〈有明初葉與帖木兒帝國之關係〉，載《邵循正歷史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頁86—98）已指出永樂帝在西域隱然踵武元室「而為蒙古帝國之中心」，今人鍾焯（〈簡析明帝國的內亞性：以與清朝的類比為中心〉，《中國史研究動態》，2016年，第5期，頁36—42）亦舉出明清「內亞」統治策略的若干相似之處。作者則將其發展為一種獨特的分析視角，為明代政治史、民族關係史、國際關係史研究開闢新路徑。雖有不足之處，仍不失為一部佳作。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楊曉銳

**張瑞威，《想吃好的：明清中國的稻米種植和消費》，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4年，204頁。**

人類「創造歷史」，須先能夠生活，而能夠生活，則須解決維持人類生命的食物供給及營養物質來源。稻米作為供給營養物質的農作物之一，歷來深受農學研究重視，與稻米相係的話題在歷史學領域則多集中於米價、米穀貿易、賑災調劑等政治經濟研究範疇。今張瑞威《想吃好的：明清中國的稻米種植和消費》一書從社會生活出發，將研究目光放置在明清稻米的種植與消費，通過華南與長江中下游地區時人對主雜糧的取捨及對稻米口味的追求，進一步探討影響明清長途稻米貿易的關鍵因素。

該書緣起於作者對20世紀50年代江南人和廣州人選食稻米及其歷史邏輯的關注，問題緣起部分梳理了作者對江南、華南地區稻作農業的現實關懷，即江南稻米供食之況以及華南城市人口對食用稻米的堅持與追求，繼而追問「主雜糧之取捨基於何種考量因素」、「消費者對稻米品種與口味的追求如何影響區域性長途米糧貿易」。

除問題緣起、結論外，全書共分4章。第一章「江南有耕牛嗎？」從耕牛與稻作生產角度考察明清華北和長江中下游地區稻米種植的差異。華北地域廣闊但土壤乾涸，其耕作難度之大使得牛耕成為重要手段，但該地並不宜規模化的稻米種植。有史以來，長江流域作為稻作適種區，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已發展出成熟的稻米生產技術。及至宋代，朝廷對長江流域糧食供應能力的重視隨國家重心南移倍增。作者通過狩野永納本《耕織圖》考察長江中下游稻米生產過程中「拔秧」「移秧」種植技術、「戽斗」「翻車」灌溉工具及耕牛的應用，以上舉措皆為了提高稻米收成效益。位於中游的江西氣候濕潤、無霜期長，頗適水稻種植，牛耕頻繁運用於稻作工序。但耕牛並不適合下游江南地區的稻作，因江南地少又不集中，且貧苦人力充足，同時慮及耕牛飼養成本，農民多改用鉄搭完成同一工序。學者亦指出鉄搭對「乾田化」階段的江南平原進行深耕具有深刻意義（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頁56—57）。綜上，長江中下游的稻米種植方式不僅因時因地制宜，亦有耕種成本的計算。時人基於長期生發性這一深層機制發展出配套的稻作方式和秩序，且同期的江南士大夫基於獨特地域性農作的考量，就稻米種植技術進行相關著述創作，推動江南地區稻作生產文化的在地化發展趨向。

「清初華南稻米貿易的緣起」一章着眼於華南地區的糧食種植與消費，並溯及稻米的商品化和西江米糧貿易的發展。相對稻米這一主糧而言，華南人對雜糧的選擇避不開番薯，因該地區氣候炎熱、光照充足，適合番薯繁育，且番薯十分高產，迅速成為普通人家的不二之選。但華南富裕階層對味道的慣習經由歷代發展已不易更改，其對稻米的執着追求亦產生一系列連環效應。作者通過梳理清初廣東米價之爭相關檔案，從朝廷和地方互動視角對廣東稻收豐歉進行考察，並指出應對廣東稻米之需的舉措有二：一是進口暹羅米，但諸方慮及稻米進口貿易的成本和收益，使得境外進口的實踐無以為繼；一是通過船運經途西江流域從廣西輸出稻米以作補充。作者考察西江米糧貿易的盈縮年份，指出18世紀西江米糧貿易的關鍵在於消費者對稻米價錢以及口味的選擇，並進一步指出華南米糧貿易的起點是富裕階層對稻米作為主糧的堅持（頁102）。概言之，華南消費群體考量稻米種類與價格從而做出消費選擇，繼而影響着西江米糧貿易市場活動。

隨即全書將目光轉到長江下游的江南地區，「對稻米挑剔的江南人」一章重點分析了18世紀江南人對稻米品種與口味的選擇，進而探討稻米種類的供求關係如何影響長江流域的米糧貿易。地域及傳統慣習對飲食的影響已然

根深蒂固，如書中作者引杭州海寧人談遷離鄉北游，繼而飲食不適痛感思鄉的例子，初步呈現了江南人與稻食的密切關係。明清時期的江南作為富庶之地，小民對於糧食的選擇倚重小麥、小米等雜糧，而有餘之家的取捨則更為講究。江南許多地區尤其是太湖一帶出產每年僅限一造的粳米，且粳米富含澱粉，食之香甜，因此價格也較為昂貴，其消費對象主要為富裕家庭。而無法消費本地米穀又不慣食雜糧者則傾向於選食外地廉價稻米。這種消費取向與需求進而影響長江流域的米糧貿易，即中游地區出產的廉價秈米向下游地區傾銷（頁124）。換言之，作者認為市場是推動稻米種植的真正力量，而市場活動是市場主體經由考慮和計算所做出的抉擇（頁131）。於明清江南地區而言，江南人對稻米口味與品種的追求作用於米糧貿易市場的競爭活動，進而影響着稻米的再種植與消費。

以上對華南地區、長江流域糧食種植與消費的個案分析初步勾勒出稻米之生產、消費者之取捨以及區域性長途米糧貿易發展的圖卷。緊接着「應對米貴的辦法」這一章節着重探討制度與市場因素對米糧貿易的影響與塑造，進一步考察明朝長途稻米貿易的發展機制。傳統帝制時期，統治者基於仁政、養民理念，防範子民深受飢餓之苦。每每飢荒之年，政府多採用施粥賑濟以及官府糧倉調控辦法，前者是地方應對飢饉年歲，維穩社會的重要實踐，但粥廠的管理和成效頗考驗州縣的能力；後者如清代常平倉，作為米糧糴糶實踐制度化的措置，深刻展現了政府制度管理與市場運行的微妙關係。作者梳理清廷對常平倉的調試與運作舉措，就平糶定價、米貴元凶問題進行分析，指出政府以「荒政」名義對稻米貿易市場進行低干預性的調控。同時，傳統互通有無的觀念亦在米糧貿易中發揮關鍵作用。統治者除了監督米糧市場的發展態勢和動向外，並未強行干預米商行為，使得清初長程米糧貿易得以順利進行（頁158）。加之統治者反對人為因素（如地方限制米穀出口）對米糧市場的干預，且利用朝廷倉儲制度與自由市場角力，但倉儲制度的運行並未能取締米糧貿易市場的選擇與發展，雙方反而形成合作狀態。由此，清代自由米穀市場得以出現和發展，國家決策與努力亦保證清初長程米糧貿易的自由。

「想吃好的」作為貼切生活實際的人文關懷，誠如作者所說，其「並不單單指食物的味道和營養，也包含該食物所體現的社會地位」（頁80），即明清時人對稻米的選擇經由飽腹到追求品味的演變，其背後蘊含着區域物質發展水平、傳統文化慣習對稻作生產、消費、貿易等一系列鏈條諸環節的作用與影響。亦如陳春聲所言：「『地域空間』實際上『全息』地反映了多重

疊合的動態的社會經濟變化的『時間歷程』。」（陳春聲，〈走向歷史現場〉，載鄭振滿，《鄉族與國家——多元視野中的閩臺傳統社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叢書總序〉），從明清時人對主雜糧及稻米價格與口味之考量可管窺長江流域與華南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演變歷程。且該書就人口壓力論這一農業起源說與學界頻頻對話，如探討兩廣流域米糧貿易繁榮之因時，陳春聲提出廣東人口壓力的思考，而作者認為人口並非關鍵（頁94），因為雜糧可作為食用之選，究其根源是廣東消費群體對稻米口味和價格的考量，進而指出西江米糧貿易盈縮的關鍵在於廣東本省稻米收成的豐歉。再如討論長江流域龐大米糧貿易時，作者認為人口論仍是李伯重研究明清江南經濟史的核心理論，雖然李氏早期提出長江米糧貿易興盛源自「市場發展下地域經濟的分工」（頁113）一說，但李氏並未進一步討論這種分工何以形成與發展。

該書係張瑞威繼《米價：十八世紀中國的市場整合》后又一米糧研究著述，將研究視野放置明清稻作地區與稻食者的消費傾向，擷取「想吃好的」這一有趣關懷展開探討，讀來令人頗為沉浸，但由於資料限制及研究視角的不同，該書尚有值得深入探究之處。我們注意到中國幅員遼闊，地域特點紛呈但區域間關係密切，對明清稻米種植與消費的考察除了兩廣、江南地區外，也應着眼於長江中游經濟發展較為延緩的兩湖植稻地區，更應注意到區域經濟與社會轉型如何影響着稻米種植與消費。明中葉到清初的農業轉型使得農民趨向於種植高利潤的經濟作物，棉花、藍靛等經濟作物與稻爭田（Yiyun Peng, “Mountains as the Lifeline: Shifting Agricultural Policies in Upland Southeast China, Sixteenth- Nineteenth Centurie,” *Late Imperial China* 45: 1 (2024): 41-77），此社會背景下，譬如江南地區的糧食缺口，除仰仗長江中游的廉價秈米外，亟需外地輸入米穀加以供給，這對區域間的米穀流通以及明清長途米糧貿易市場的整合有何意義？此外，本書重視消費群體對稻米口味和價格的考量，以此視角來理解明清華南及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稻作產銷，口味、慣習等作為非米糧市場因素較為主觀。換言之，時人對稻米口味的選擇和消費在多大程度上與品味追求、社會地位相關聯？「想吃好的」這一理念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着稻米產銷及長途米糧貿易市場活動？對此類話題進行深入的實證研究亦是我們可進一步豐富的空間。同時，該書的討論群體以富裕階層為代表，在宏大社會歷史研究進程中往往有被忽視的普通群體畫像，例如長途米糧貿易網絡下，稻米不僅是生計作物更是經濟作物，稻農再生產、普通小民生計之食會與稻米種植、消費產生何種因應？我們應在明清社會歷史發展

的脈絡下，體會這些「沒有歷史」的小人物在時代洪流中的歷史處境，進一步在社會經濟史研究中探討稻米產銷與米糧貿易市場的動態性、多樣性，豐富明清時人「想吃好的」這一追求如何參與米糧貿易市場的歷史建構。

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  
何麗蓉

**楊國安，《民間文獻與明清兩湖鄉村賦役徵收實態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24年，321頁。**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楊國安教授長期致力於兩湖地區鄉村社會經濟史研究，在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修訂出版的《明清兩湖地區基層組織與鄉村社會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以里甲、保甲、團練等鄉村基層組織為切入點，考察基層組織與地域社會之間的互動過程，隨後出版的《國家權力與民間秩序：多元視野下的明清兩湖鄉村社會史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圍繞宗族、水利與保甲、團練，進一步探討鄉村組織與基層社會控制，新著《民間文獻與明清兩湖鄉村賦役徵收實態研究》則聚焦鄉村賦役徵收問題，是作者在兩湖地區深耕多年的又一重要成果。3本著作共同構成作者「鄉村史研究的三部曲」，其中戶籍管理、賦役徵收、社會控制等是作者持續關心、推進的核心議題。

中國疆域遼闊，區域之間存在很大差異性，制度在施行的過程中往往因地而異。本書以明清兩湖基層賦役徵收實態為主題，旨在探討各項賦稅徵收政策的制定、實施過程以及在基層社會中的運作實態，呈現「制度的地方化」。主要內容包括賦稅徵收的依憑、賦稅徵收的過程、賦稅徵收所引發的各類社會矛盾與糾紛，這3部分遵循明清賦役制度演變規律，構成一個具有內在邏輯體系的整體性綜合研究，系統、全面地勾勒出兩湖地區基層社會賦役徵收的歷史圖景。本書除緒論、結語外，共分為7個章節。

第一章「土地清丈與地籍的編纂」以時間為序，分別探討明初里甲制推行下的冊籍系統、萬曆時期的土地清丈與里甲賦役調整、康熙年間的清丈與地籍編纂。作者指出，從明至清，賦役徵派的對象經歷了由人到地的嬗變過程，萬曆清丈是這一轉變的關鍵環節和重要體現。萬曆清丈之後，重新編纂的魚鱗圖冊和其他土地冊籍，成為賦役徵派的重要依據；與此同